



陈桐生 著

《孔子诗论》研究

中
华
文
史
新
刊

中华书局

ZHONGHUA WENSHI XINKAN

本书是一部全面探讨《孔子诗论》内涵的专著。作者将战国《诗》学分为南北两派，认为《孔子诗论》是南方《诗》学的代表作，并初步考订其成书于子思之后孟子之前。作者在先秦两汉《诗》教发展史的广阔背景下，对《孔子诗论》从说《诗》方法、诗的题旨、理论倾向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，指出《孔子诗论》已经触及到中国诗论最核心的问题。全书纵论上下几千年历史，出入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物之间，视野开阔，材料翔实，立论审慎。

中 华 文 史 新 刊

《孔子诗论》研究

陈 桐 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孔子诗论》研究/陈桐生著. - 北京:中华书局,2004
(中华文史新刊)
ISBN 7-101-04482-4

I. 孔… II. 陈… III. 孔丘(前 551 ~ 前 479) - 诗歌 - 文学理论 - 研究 IV. ①B222.25②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20025 号

-
- 书 名 《孔子诗论》研究
丛 书 名 中华文史新刊
著 者 陈桐生
责任编辑 齐浣心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-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
版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
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印张 11 字数 248 千字
- 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4482-4/I · 587
定 价 23.00 元
-

目 录

从《孔子诗论》看战国南楚《诗》学(代序)	1
一 战国南北学术中心	3
二 战国南楚的经学研究	17
三 战国南楚《诗》学特点	22
四 本书宗旨和方法	33
第一章 《孔子诗论》的作者与时代	36
一 孔子说	38
二 子夏说	70
三 子羔说	79
四 子上说	83
五 不知名说	85
六 竹书成书年代考	88
第二章 《孔子诗论》学术思想考源	97
一 竹书之前的诗乐教化传统	99
二 竹书《诗》旨溯源	143
第三章 《孔子诗论》的理论创新	155
一 说《诗》方法的重大转变	157
二 概括四类《诗》旨	173
三 初步确立说《诗》理论模式	183
四 竹书未涉及的理论	204
第四章 《孔子诗论》与汉代《诗》学	210

一	汉代《诗》学的两大来源	212
二	荀子:从南楚《诗》学到汉代《诗》学的 中间环节	213
三	《孔子诗论》在汉代或有传本	218
四	《孔子诗论》与《鲁诗》	224
五	《孔子诗论》与《齐诗》	233
六	《孔子诗论》与《韩诗》	238
七	《孔子诗论》与《毛诗》	240
附录一	《孔子诗论》简注	257
附录二	《孔子诗论》与先秦两汉说《诗》文献对照表	273
附录三	《孔子诗论》研究论著目录索引	315

从《孔子诗论》看战国南楚《诗》学

（代序）

提要 战国时期有南北两个学术中心：一是在北方齐国的稷下；另一则是在南楚。南楚学术活动贯穿战国始终，战国所有学派都在南楚从事学术活动，南楚学术活动的地点是由郢而迁陈，他们的学术创造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战国《诗》学也分南北两派：北方以孟子《诗》学为代表，其特点是主张以史说《诗》、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；南楚《诗》学以《孔子诗论》为代表，在说《诗》方法、分类概括题旨、建立说《诗》理论模式几个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1994年，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回1200多支盗挖的竹简，当时传闻这批竹简来自湖北，上海博物馆的整理人员就将这批竹简称之为战国楚竹书。这些竹书是秦始皇焚书之前的写本，与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《郭店楚墓竹简》性质相近。经过有关专家近七年的研究整理，这批国宝级的竹书正陆续与

读者见面。《孔子诗论》是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(一)中的一种,它一共有 29 支竹简 1006 字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出版。由于简序已经混乱,绝大多数竹简都有残缺,作者又是用战国楚文字抄写,辨认极为不易,所以在文字释读上十分困难。经过专家的艰苦努力,竹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内容大体可以释读,只是还有一些关键字的释读还存在不少分歧和疑问^①。竹书《孔子诗论》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《诗》学专著,因而它在面世之后,就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,学者们就简序排列、竹书作者、成书时代、文字释读和理论阐释诸方面展开热烈的探讨。在竹书尚未面世之前,先秦《诗》学研究没有专著,有关《诗》学材料散见于传世先秦文献之中。如何从先秦零碎的《诗》学评论一下子飞跃到汉代四家诗那样体例统一、结构完整的成熟《诗》学专著,这对后人来说一直是一个谜,出土竹书弥补了这个中间环节,它在说《诗》方法、《诗》旨提炼、分类研究以及理论模式方面均为后人作出了富有价值的探索,堪称汉代四家诗的先驱。特别是竹书关于诗歌性情与礼义关系的论述,触及到中国诗论的核心问题,对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这部论《诗》专著出于南楚的土地,它所代表的是战国南楚

① 《孔子诗论》文字释读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:一是对同一个字,不同专家有不同的释读,而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;二是还有少数字没有释读出来。李学勤在为刘信芳《孔子诗论述学》一书所作的《序言》中指出:“应该承认,简中尚有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字,没有释读出来。我们识别战国文字,尤其是战国楚文字的能力,近年已有提高,但限于条件,有待解决的地方还有好多,非一举手一投足所能克服。继续提高水准,有待于更多的努力,以及更新的发现。”

的《诗》学成就^①。我们原来心目中的南楚是一个蛮夷诸侯国，在文化学术方面，除了楚辞之外，我们只知道与南楚沾一点边的老庄。随着近年来楚简的相继面世，有关楚国学术方面的材料日渐丰富，我们要以全新的目光来重新审视战国南楚的学术地位，重新估计南楚对中华学术所作出的伟大贡献。对竹书《孔子诗论》，我们应该将它定位在战国南楚《诗》学之上，放在战国南楚学术环境中加以考察。

一 战国南北学术中心

战国时期有南北两个学术中心。北方学术中心就是齐威王、齐宣王所设置的稷下学宫，南方学术中心则在楚国。对北方的稷下学宫，司马迁用充满气势和激情的笔墨，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中作了详细的记载，但对南楚的学术活动则写得比较零散。楚王室贵族虽然像齐人一样礼遇学者，但却没有建立一个像稷下那样专供学者“不治而议论”^②的学宫，这可能是司马迁没有集中记载南楚学术活动的原因之一。司马迁对战国楚学虽然没有作专篇介绍，但他还是在《史记》中不时对此予以指点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载荀卿在齐国稷下遭谗而适楚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，春申君死而荀卿废，因居家兰陵而专门从事著述，“于是推儒、墨、道德之行事兴坏，序列著数万言而卒。”据此，今天我们所读的《荀子》应该是荀卿作于楚国兰陵（今山东

① 《孔子诗论》有没有可能是从北方传入南楚之后被埋入楚墓的？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发现竹书写于北方的证据，倒是它与北方《孟子》的《诗》学观有明显的区别。所以，本书将它视为战国南楚的《诗》学专著。

② 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。

苍山县)。《史记·李斯列传》载楚人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，李斯学成后度楚王不能成事，乃西入秦。据此推测，李斯受学于荀卿应该是在荀子家居兰陵之时，这说明荀子在兰陵除了著述之外还讲学授徒。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载“春申君客三千余人，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”，这三千多食客是学者还是策士、谋臣、侠客，司马迁对此没有说明，从相关文献推测，春申君所养的客可能大多是谋臣策士。春申君为楚相是在考烈王之时，当时楚都的地点是在陈（今河南淮阳），春申君本人的封地则在淮北，所以战国后期楚地学者的学术活动应该在陈、兰陵、淮北一带。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记载了屈原和“皆好辞而以赋见称”的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楚辞作家，楚辞本不算学术，但由于楚辞中包含了丰富的学术内容，我们姑且把楚辞纳入学术进行论述。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又载：“楚有尸子、长卢。”^①又说：“自如孟子至于吁子，世多有其书，故不论其传云。”这与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所说的“至其书，世多有之，是以不论，论其轶事”的著述原则是一致的。司马迁能够写出管仲、晏婴的轶事，但他却不知道楚地学者的轶事，这样他就自然少花笔墨了，这可能是司马迁未能集中记载楚学的又一原因。

司马迁之后，南朝大理论家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时序》中第一次清楚地表述了战国有南北两个学术中心的观点：“春秋以后，角战英雄，六经泥蟠，百家飚骇。方是时也，韩、魏力政，燕、赵任权，五蠹六虱，严于秦令。唯齐、楚两国，颇有文学：齐开庄衢之第，楚广兰台之宫，孟轲宾馆，荀卿宰邑；故稷下扇其清风，兰陵郁其茂俗；邹子以谈天飞誉，驺奭以雕龙驰响；屈平联藻于

^① 尸子是法家人物，长卢不详，《史记正义》说有《长卢子》九篇传世。

日月，宋玉交彩于风云。”刘勰心目中的南方学术中心，其学术代表人物仅局限于荀卿、屈原、宋玉数人^①，其地点兼指郢、陈和兰陵，其时间是在战国中后期怀、襄、考烈之世。近代学者刘师培作《南北文化不同论》^②，梁启超作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^③，倡导学分南北，而以老、庄、屈原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人物。老子的籍贯虽然是楚国苦县，但老子本人是周王室柱下史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老子所代表的更多的是史官文化传统^④。据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记载，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作于出关之时，并非作于楚地。《庄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史记》等书载孔子问礼老聃，其地点都是在周王室，而不是在楚地，老子本人并没有在楚国从事学术活动。所以，与其说老子代表的是南楚文化，倒不如说老子代表周王朝史官文化更为合适。庄子为宋之蒙人，宋国后来为楚所灭。据《庄子·秋水》，庄子辞去了楚王的千金之聘，他的学术思想主要来源于《老子》，并没有参与郢都的学术活动。《庄子》一书中有不少巫文化内容，前人多以此作为庄子受南楚巫文化影响的证据，殊不知宋为殷商之后，而重巫鬼正是商宋文化一脉相承的特色。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楚国的巫文化也是从殷商继承而来的^⑤。结合这些材料来看，老、庄与楚国只有

① 严格地说，屈原、宋玉是辞赋作家，并不是学者。刘勰的“文学”概念，相当于文章学，包括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。

② 参见刘师培《刘申叔遗书》（上册）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版。

③ 参见梁启超《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版。

④ 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“道家者流，盖出于史官。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，然后知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”

⑤ 杨公骥《楚的神话、历史、社会性质和屈原生平》，载《杨公骥文集》，东北师大出版社，1998年版，第238—239页。

一些边缘联系,所以,以老、庄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,是一种打擦边球的方法。

司马迁、刘勰、刘师培、梁启超都是根据他们当时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而得出各自的结论,他们没有机会看到沉睡在南楚地下的这些文物。我们这一代人要比司马迁、刘勰们幸运一些,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^①,1994年,上海博物馆收藏了1200支战国楚竹简^②,这两批出土楚文献为我们研究战国楚学术提供了新资料,它清楚地表明,在战国南楚,确实存在一个具有相当规模、流品复杂、著作丰富、影响巨大的学术中心,足可以与北方的齐国稷下学宫相媲美。我们有必要结合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,对南楚作为战国学术中心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再认识,进一步弄清它的内涵,以得出准确无误的结论。

首先,南楚作为战国学术中心的时间应该向前推,即从战国中后期楚怀、襄、考烈之世而一直上推到战国前期。事实上,南楚的学术活动贯穿整个战国时代。前期有儒、墨、法家各派,战国中期随着百家争鸣的深入,诸子百家都在南楚开展学术活动,像儒、墨、名、农、纵横、兵家都活跃在楚国政治学术舞台,南楚学术在此时达到鼎盛阶段。后期南楚除了上述诸子之外,又增添了辞赋作家和神仙家。郭店和上博两批竹简中的学术著作,有的大约是在战国中期前后传入南楚的,有的则是由楚地学者著述的^③。郭店竹简中的《性自命出》,据学者们研究,应该是子思

① 参见《郭店楚墓竹简》,文物出版社,1998年版。

② 经过近七年的研究整理,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第一册、第二册分别于2001年11月、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
③ 在讨论成书年代时,应该将它的著述年代与作为随葬品入墓年代区分开来,有些著作,如郭店简《老子》、上博简《周易》,其著述书代都相当早,但它们入墓却在战国中后期。

学派的作品。子思生活在战国前期，与鲁缪公同时。庞朴等人认为，《性自命出》填补了从孔子到孟子之间的中间环节，是孟子性善论的重要来源^①。此说若能成立，那么《性自命出》就应该是战国前期的作品。现在我们不能判定《性自命出》是北方著作传入南楚，还是子思派学者由北而南从事著述，总之，从它成书到楚贵族将其视为重要著作而列为殉葬品，应该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。如果《性自命出》在社会上毫无影响，如果没有充分认识到竹书的重要性，那么这位楚贵族是不会将它带到阴间寝宫去“阅读”的。这就意味着在战国中期之前，郢都一带已有子思学派的学者在从事学术活动。上博简《性情论》与郭店简《性自命出》在内容上大体相同而略有出入，应该是同一篇论文的两个抄本。它进一步说明，性情问题是子思学派的关注焦点，他们的学术观点已经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，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同一部竹书重出楚墓的情况。为什么战国中期南楚学术最为兴盛？这除了时代学术条件之外，还与南楚的国际环境有关。楚自春秋中叶以来一直在国力上领先于中原诸侯，但到战国中期，秦、齐、三晋等一批诸侯国先后崛起。《史记·楚世家》载：“宣王六年，周天子贺秦献公，秦始复强，而三晋益大，魏惠王、齐威王尤强。”秦、齐与三晋的迅速崛起可能使楚国感受到空前的压力，因此加大了招贤纳士的力度，大批北方学者因此闻风接踵进入楚国。文献中有楚威王拜士为师的记载，《吕氏春秋·去宥》说：“荆威王学书于沈尹华。”楚人以为楚王是沈尹华的弟子。钱穆在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中猜测，这个沈尹华就是子华子，与《战国策·楚策》中的莫敖子华同为一入。《史记·十二

① 马宝珠《郭店楚简：终于揭开一个谜——访庞朴》，载《光明日报》1998年10月29日。

诸侯年表》又说铎椒为楚威王傅,看来楚威王的老师还不止一人。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载楚威王闻庄子贤,欲以千金拜庄子为相,此说出于《庄子·秋水》,论者或以为是寓言而未可尽信,但联系《战国策》和《吕氏春秋》关于楚威王尊士为师的记载,此说不一定是空穴来风。楚威王拜士为师,晚于魏文侯,而早于齐宣王、燕昭王,在战国中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一件带有刻铭的漆耳杯,李学勤将刻铭释为“东宫之师”,认为墓主的身份应当是楚太子的师傅^①。郭店一号楚墓之中有一棺一椁,论者以为墓主的身份为低级贵族,属于士的级别。这与战国时期诸侯贵族拜士为师的背景正好相符。据李学勤考证,郭店一号楚墓的年代,约当公元前4世纪末,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^②。而这正处于威、怀之世^③。楚王室尊士的高峰期,正好是战国百家争鸣的高潮期,同时也是楚地学者简帛著述最为繁荣的时期。这从侧面证明,战国中期的南楚在尊士方面明显带有学术目的,它很可能是楚王室向士寻求理论指导,因而尊士的直接结果就是带来了楚国学术的繁荣。楚国物质极大丰富,它的经济条件像今天的深圳、上海一样,对当时学者们有很大的吸引力,春申君的上客都能“蹶珠履”,比冯谖的“食有鱼”、“出有车”高级得多,可见当时楚地

① 李学勤《关于东宫之师的讨论》,《简帛二〇〇一》(上册),广西师大出版社,2001年版,第45页。

② 李学勤《荆门郭店楚简中的〈子思子〉》,《中国哲学》第二十辑,第79页。

③ 事实上楚国威、怀之世正是楚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,它说明楚威王虽然以尊士著称,但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强国之路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声称自己找到了一条使楚国强盛的道路,并愿意为王“导夫先路”,但却不能为楚怀王所用。

学者待遇的优厚。当代简帛多出土于楚地，而学术价值之高，数量之多，乃远在他国旧土之上，这说明楚王室贵族和楚地学者都很重视文化学术著作的传抄，这应该是以楚国雄厚的经济实力作支撑的。因此楚国成为战国时期天下学术中心，乃是合情合理逻辑的事情。

其次，南楚学术活动的内容决不仅仅止于儒家和辞赋家，南楚学术活动的主体决不止于荀卿、屈原、宋玉数人，它包含了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名、农、神仙、兵、阴阳、神仙方术、辞赋各派，其学术阵容要比我们以前所知的要大得多，学术活动的内容也要比我们以前所了解的要广泛丰富得多。郭店简中的《老子》、《太一生水》是黄老学派的著作，而《缁衣》、《五行》、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、《穷达以时》、《唐虞之道》、《忠信之道》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六德》、《尊德义》及《语丛》等，则是儒家的哲学政论作品。上博简内容更为广泛，“楚竹书内容涉及哲学、文学、历史、宗教、军事、教育、政论、音乐、文字学等，为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，先于秦始皇的‘焚书坑儒’，其中以儒家类为主，兼及道家、兵家、阴阳家等”。^① 证之以传世文献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战国时期几乎所有学派都在楚国留下了足迹。墨家学派在楚国有频繁的活动，《墨子·鲁问》载公输般自鲁南游于楚，教楚人舟战之器，作为钩强之备。《墨子·公输》载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，将以攻宋，墨子行十日十夜而至郢，及时制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流血战争。余知古《渚宫旧事》卷二又谓墨子至郢献书楚惠王，钱穆在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中以为墨子止楚攻宋与献书楚惠王同为一时之事。《墨子·鲁问》又载鲁阳文君与墨子

^① 陈燮君《序》，载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（一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版，第2页。

论及攻郑之事，鲁阳文君是楚国的县公，这是墨子暮年的事情，它说明墨子一生中两次至楚。墨子弟子耕柱子则仕于楚国。《韩非子·显学》说：“自墨子之死也，有相里氏之墨，有相夫氏之墨，有邓陵氏之墨。”《庄子·天下》说：“相里勤之弟子，五侯之徒，南方之墨者苦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属，俱诵《墨经》，而倍谲不同，相谓别墨。”楚公子纂食邑邓陵，因以邓陵为氏，因此邓陵氏之墨是南楚的墨家学派。《吕氏春秋·上德》说：“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，阳城君令守于国。毁璜以为符，约曰：‘符合听之。’荆王薨，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，阳城君与焉。荆罪之。阳城君走，荆收其国。孟胜曰：‘受人之国，与之有符，今不见符，而力不能禁，不能死，不可。’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：‘死而有益阳城君，死之可矣。无益也，而绝墨者于世，不可。’孟胜曰：‘不然。吾于阳城君也，非师则友也，非友则臣也，不死，自今以来，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，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，求良臣必不于墨者矣。死之，所以行墨者之义，而继其业者也。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。田襄子贤者也，何患墨者之绝世也？’徐弱曰：‘若夫子之言，弱请先死以除路。’还歿头前于孟胜。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。孟胜死，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。以致令于田襄子，欲反死孟胜于荆，田襄子止之曰：‘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。’不听，遂反死之。”墨家为楚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演出了士为恩主献身的慷慨悲壮的一幕。道家是楚国学术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于诸子略道家类著录《鬻子》二十二篇，班固注：“名熊，为周师，自文王以下问焉，周封为楚祖。”这本《鬻子》可能出于战国楚地道家学者之手。同篇著录《蜎子》十三篇，班固注：“名渊，楚人，老子弟子。”又著录《长卢子》九篇，班固自注：“楚人。”又著录《鹖冠子》一篇，班固自注：“楚人，居深山，以鹖为冠。”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写道：“蜷婞直以亡身兮，

终然殒乎羽之野。汝何博謇而好修兮，纷独有此姱节？……众不可户说兮，孰云察余之中情？世并举而好朋兮，夫何愆独而不予听！”这虽然是借女嬃之口说出，但这种摧刚为柔、混同世俗的观点却是道地的道家思想。《楚辞·渔父》载渔父劝屈原说：“圣人不凝滞于物，而能与世推移。世人皆浊，何不泥其泥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醪？何故深思高举，自令放为？”又唱《沧浪歌》曰：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这种委任自然随波逐流的处世态度，正是《庄子·人间世》所阐述的内虚外顺的思想。郭店简中有一批道家竹简，特别是竹书《老子》是现今发现最早版本的《老子》，这些进一步证明道家思想在楚国有广泛的传播。据马承源介绍，即将整理面世的上博简《恒先》是一篇珍贵的道家文献。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《老子》，也应该属于南楚学术系统。名家的大本营在赵、魏一带，但《战国策·楚策》：“张仪逐惠施于魏，惠子至楚，楚王受之。”如此则名家也到过楚国。农家是战国时期影响较小的一个学派，但在楚国却有一批治农家的学者，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至滕，要求做滕文公治下之民，“其徒数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、织席以为食。”许行是楚人，他的弟子田鸠也在楚国任职。《吕氏春秋·首时》载：“墨者有田鸠，欲见秦惠王，留秦三年，而弗得见。客有言之于楚王者，往见楚王，楚王说之，与将军之节以如秦，至因见惠王。”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亦载楚王与田鸠讨论墨学风格^①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野老》十七篇，班固自注：“六国时，在齐、楚间。”可见农家在楚国有相当大的势力。纵横大家苏秦、张仪倡合纵

① 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于墨家类著录《田俅子》三篇，不知田俅子是否就是田鸠。

连横,楚国是他们的重要游说对象,对此《战国策·楚策》和《史记》中《苏秦列传》、《张仪列传》、《屈原贾生列传》、《楚世家》有较多的记载。其他策士如苏厉、陈轸、昭雎、魏加等人也是楚国的上客。法家直接参与了楚国的政治生活,吴起是战国前中期法家的代表人物,因在魏受谗而入楚,为楚悼王相,“明法审令,捐不急之官,废公族疏远者,以抚养战斗之士。要在强兵,破驰说之言从横者。”^①在楚国掀起了一场变法的风暴,可惜的是这次变法因悼王去世而夭折。《战国策·楚策》载:“楚襄王为太子之时,质于齐。怀王薨,太子辞于齐王而归,齐王隘之:‘予我东地五百里,乃归子。子不予我,不得归。’太子曰:‘臣有傅,请追而问傅。’傅慎子曰:‘献之地,所以为身也。爱地不送死父,不义。臣故曰,献之便。’太子入,致命齐王曰:‘敬献地五百里。’齐王归楚太子。”这个“慎子”可能就是法家代表人物慎到,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慎子》四十二篇,属于诸子略法家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于小说家类著录《鬻子说》十九篇,班固自注:“后世所加。”这可能是战国时期楚国小说家的著作。楚国也有兵家学者,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于兵形势家著录《楚兵法》七篇。同篇又著录《景子》十三篇,考《战国策·楚策》所载:“楚王使景阳为将救燕。”则《景子》或许就是景阳之兵书。上博简中有兵书,为楚国兵家活动提供了新资料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序数术云:“六国时楚有甘公。”并著录甘德、长柳《占梦》二十卷。从这些著作可以想见术士在楚国的活跃。《楚辞·远游》借用《离骚》关于天国神游的构思,来表达神仙家思想:“闻赤松之清尘兮,愿承风乎遗则。贵真人之休德兮,美往世之登仙。”“轩辕不可攀援兮,吾将从王乔而娱戏。餐六气而饮沆瀣兮,漱正阳而含朝

^① 《史记·孙子吴起列传》。